

北航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博观文丛

The Contemporary China

当代中国
社科名家文库

刘东

我们的学术生态
——被污染与被损害的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北航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博观文丛

我们的学术生态 ——被污染与被损害的

刘东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的学术生态:被污染与被损害的 / 刘东著. —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6
ISBN 978-7-308-10085-4

I. ①我… II. ①刘… III. ①学术研究—中国—文集
IV. ①G3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31110 号

我们的学术生态——被污染与被损害的

刘 东 著

责任编辑 陈丽霞

封面设计 彭若东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省邮电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960mm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259 千

版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0085-4

定 价 4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博观文丛》序言

两年前我受命组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暨知行文科实验班,对于如何在一个理工科强势的大学开展本科生的通识教育和高水准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虽然胸中隐有沟壑,但仍感举步维艰,好在诸位学界朋友的鼎力支持,加上一批青年才俊的加盟共进,遂使我们的探索逐渐走上一条教书育人的正道。

记得高研院创建不久,我与年轻的同仁们就筹划编辑三套文丛,分别起名为:博观、通识和知行。《博观文丛》旨在收录北航高研院讲席教授及其他教授学者的著作,把他们的学术研究、社会评论和为实验班的讲课纲要结集出版,呈现高研院各种师资力量思想风采;《通识文丛》则是北航高研院的集体科研报告,集中于国内外通识教育的精粹选章和评议,彰显我们关于通识教育的理念以及实践与经验;《知行文丛》作为北航高研院的学术院刊,以青年讲师为主编,文史哲入口,政经法出口,厘清每辑主题,从容打造我们的思想旗帜。经过两年来的辛苦操持,三个文丛现都已陆续底定,不久即将面世出版。

今日为《博观文丛》写序,对于我来说可谓一件“轻省的重负”。昔日苏轼《送张琥》曾有云:“呜呼,吾子其去此而务学也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吾告子止于此矣。”曾国藩在《孙芝房侍讲当论序》写道:“著书之多,与茶云异,而其博观而慎取则同。”面对第一辑九册我的学界朋友的“呕心”

之作,除了感铭之情,我觉得有必要重申我们北航高研院持守的理念。这一点我曾经在即将开通的北航高研院网站,以院长致辞的名义写过,现不妨抄录如下:

思我中华,历经古今之变、中西之争已有百十余年,然自由、民主、宪政之中国仍在艰难的建设途中。一个国族之兴亡,原因固然很多,但教育当为根本,百年前梁启超就有新民之说,国民之教育,人才之培养,关涉中华未来。大学培育何种人才,虽见仁见智,但不可讳言,凡数十年来,狭隘的功利主义教育观畅行于世,精神品质的塑造丢弃久矣。在我看来,通识教育从根本上说乃是一种自由教育,培育自由的人格,塑造伟大的心灵,才是我们的办院宗旨。鉴于此,我们的通识教育面向古今中西的经典,从三代之治到新旧经学,从雅典民主到国富新论,由古典传统开辟现代新章,击沧浪之水汇通英美海洋。让同学们在我们的研究院经受人文精神的激荡,进而在毕业之后投身社会的改良,经纬人生,成就志业,这才是我们的所愿。

《博观文丛》的出版必定会引领我们朝向那片“自由的海岸”。

高全喜

2012年3月21日于北京

自序

这个新编的集子,写作跨度长达一二十年,所以多是从以往的文集中选取出来的,当然也包括了一些新近写出而未及结集,甚至未及发表的文章。其中个别篇的标题,还为了醒目与匹配而进行了小小的调整。

居然连我本人都不无意外:把这些散漫写出的文字,以“我们的学术生态”这样一个题目收拢起来,顿时就显出一个全新的关注点来,它突出表现在本书的副标题中,即“被污染与被损害的”。——是的,正是在最近这一二十年间,自己对于这种日渐严重的污损,总有一种难以释怀的焦虑与牵念,因为几乎就是在眼睁睁地注视着,周遭的学术生态在直线地下滑,甚至干脆是朝“跌无可跌”的底线之下堕落!有时候,它简直就被污染得让我们透不过气来,简直就被损害得让我们椎心泣血……

正是出于此种心结,就不由得想要腾出一只手来,去从头建设一套《大学之忧》丛书,——而且,如果在这个出版社受到了碍手碍脚的阻挠,就拿到另一个出版社去印行,并且在新写的序言中还不免愤怒地质问一声:“难道就连别家有病都不许谈论了么?就连了解一下别人的疼痛都不行么?”

不过,还是出于此种心结,晚近以来又惊喜地发现,也多亏了心中的这一团愤怒,使得自己对于“教育研究”这块领地,已经可以算是获得了超出业余兴趣的学术关切。——每逢踏进书店,只要是看到了这个领域的好书,自己总会毫不犹豫地买下,也总会在第一时间就打开阅读。它们逐渐

地帮着自己,对于那些支配着学术活动的校园规则,无论是学术政治还是学术经济,也无论是显规则还是潜规则,都获得了越来越专业的专业知识,也装备了越来越精准的分析框架。

毫无疑问,如此坚持不懈的阅读活动,绝对不打算仅仅属于无功利的静观。还记得,自己曾对一心想要出国的北大学生说过:整个国家都指望你们改造呢,要是你们连看到身边的这点麻烦,都马上就生出了到海外逃避之念,我们这个民族还能有什么指望呢?——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这些钻研人文与社科的学者,连身边的圈子与氛围都捉摸不透,连周围的学术生态都无力自清,那么哪里还谈得上去清理天下?顶多也就是当着领导念念“海晏河清”的颂词罢了!

具体而言,本书所采撷和整理出来的,总共是七组彼此相关的文章,或者是七束有分有合的思绪。这里且扼要地逐一介绍一番:

第一组的三篇文章——《社科院的自我理由》、《保护大学生态》和《众声喧哗的大学论说》,反思的是作为一种机制的我国最高学府,尤其是自己依次工作过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曾经有过或者应当建立怎样的独特价值或理念,以保护它们原有的传统、现存的生态和发展的势头,特别是当它们介于全球化的压力下,已经面对着英风美雨而自惭形秽,遂以“没头苍蝇”似的躁动改革来盲目应对的时候。

第二组的三篇文章——《形式合理化只是必要条件和最低标准》、《“文胜质则史”的真义》和《历史与现实中的学术剽窃》,反思的是何以只是对照一下最基本的形式规则,在已称恶俗的学术界就出现了如此腐败的风气,要么只是去跟从长官意志的指挥棒,去批量生产“就跟论文似的”无聊文字;要么更公然窃取别人的文句、段落、创意,乃至问题意识,并在事发后以“乌贼战术”来把水搅浑,从而让整个舆论界更加难辨是非、让整个学界的底线更加荡然无存。

第三组的三篇文章——《汉学:入乎其内出乎其外》、《警惕人为的“洋泾浜学风”》和《中国研究中的“测不准定律”》,反思的是在当今国际汉学的

重大成就与势力、它由此自然要产生的对于本土学子的话语霸权,以及这种外来的问题意识又如何为国内的扭曲语境所发酵。事实上,洞察到当下学术场域的这种外部和内部特性,就不难看穿何以会有一批想要左右讨巧的书生,正中下怀地从国外发现了这种文化资本,从而以学术名义来为虎作伥,甚至不惜横蛮地强暴整个民族的历史记忆。

第四组的三篇文章——《不通家法》、《国学:“礼失求诸野”之后》和《清华国学和域外汉学》,反思的是在九十年代伊始的世风陡转中,本土的传统学术文化应当如何克服自身的守缺与固陋,而以真正“作为思想史的学术史”研究,来激活其自身的智慧创造过程;以及应当如何在“国学热”的难得机缘中,大力改变自身“高不成”与“低不就”的窘境,以便真正吸取早期清华国学院的成功经验,从而在同国际汉学界的平等对话中,为自身递进开拓出“并长争高”的灵动局面。

第五组的三篇文章——《大陆学术出版的现状》、《中文能否成为国际学术的工作语言?》和《知识生产:国脉所系》,反思的是国内的学术出版业如何在两种体制的夹缝中谋求自身的艰难发展,并且利用汉语共同体的众多人口而获得相对的发行优势;以及汉语学术在当今国际学界的实际失语状态,和它如何借助于通行的学术标准来获取真正的国际威望;还有尽快去理顺我国的知识生产体系,对于塑造公民社会和再造故国文明,具有怎样至关重要的意义。

第六组的三篇文章——《中等教育的自主精神》、《一团乱麻中的“文理分科”》和《先立其大与师道尊严》,反思的是中教和高教中依次出现的错误观念,包括“应试教育”如何像无情的吸血鬼一样,把我们中学的灵魂和中学生的心智,统统给吸干喝净;以及取消“文理分科”的改革动议如若不能跟文科知识的更新相配套,那么这种头疼医头的、缺乏远见的改革甚至都还不如不改;还有功利滔滔的学术界既已沦为利欲熏心的叫卖场,“先立其大”的立德教育就更不能再被讽刺为“不务正业”或“陈义过高”,而“师道尊严”的本意也绝非如“文化大革命”时批判的那样,它原是在规范教师的人

格尊严和启迪他们的学术自信。

第七组的三篇文章——《诸神与通识》、《千呼万唤“阅读传统”》和《巧舌如簧的失范状态》，反思的是作为一种无形风气的校园文化，如何在罄竹难书的种种剥蚀中逐渐残败式微，包括原本最受传统文化重视的通识教育，当年如何在西方冲击下反被当成中国的劣势，而对自家文化的弃之如敝屣，又如何使人们当下反以为西方的强项倒在于博雅教育；以及只有恢复作为心灵习性的原有的“阅读传统”，才能使我们从精神根基处摆脱文化上的被动，所以整个校园乃至社会的首要任务就是去重建这种传统；还有虽然大陆高校的“辩手”总能在电视辩论节目中占尽风头，然而在这种“看谁更巧舌如簧”的比试中，这反而只能证明谁家的校园失范更加严重，所以说到底这恰是大陆地区的最大耻辱！

最后还要说明，这本小书是应高全喜教授之邀而编集的。我和全喜兄原本兼有同乡和同窗之谊，此后也一直在学业上共享着很多追求，此外从2011年度开始，我本人又应全喜兄的邀请，而忝任了北航社科高研院的讲席教授，所以，把这个小书献给他所领导的这所新兴机构，于情于理都是不容推托的。——与此同时，我也希望此书中所表达的忧思、识断与企望，可以让他和北航高研院的其他同事，在规划和运作这所学术机构时有所触动和裨益。

当然更加希望的是，这里所进行的思绪整理，能对自己的运思活动也有所促进。前边已经说过，晚近以来竟不无惊喜地发现：自己生平所主要关注的学术领域，除了国学这个普泛的知识领地之外，还大致可以包括下述五个方面：即美学、比较文学、国际汉学、政治哲学和教育研究。而由此就不免发出想象，一旦在这方面从自发走向了自觉，那么今后的小小规划就自然应当是，逐渐就此发出更系统与更专业的研究之思。——如果跟这样的阅读和写作计划相比，或许我在这里所偶然采集到的，还只能算是一些初步的和阶段性的成果吧？

刘 东

2012年1月24日于三亚湾双台阁

目 录

社科院的自我理由	1
保护大学生态	17
众声喧哗的大学论说——写在《大学之忧》丛书前面	33
形式理性化只是必要条件和最低标准	75
“文胜质则史”的真义——历史与现实中的佞史传统	80
历史与现实中的学术剽窃	92
汉学：人乎其内出乎其外 ——答《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编者问	137
警惕人为的“洋泾浜学风”	148
中国研究领域的“测不准”原理	171
不通家法	183
国学：“礼失求诸野”之后	189
清华国学和域外汉学	195
中国大陆学术出版的现状	202

中文能否成为国际学术的工作语言？ ——就《中国学术》杂志答记者问	213
知识生产：国脉所系	221
中等教育的自主精神——与高考落榜学生的通信	229
一团乱麻中的“文理分科”	239
先立其大与师道尊严	251
诸神与通识	257
千呼万唤“阅读传统”——由《中国文库》所想到的	274
巧舌如簧的失范状态——关于电视辩论的辩论	280

社科院的自我理由^{*}

这个话题是上个春天在美国东部想起来的。

正在马萨诸塞州的一家袖珍大学闲居神聊，有位新近结识的中国留学生，突然以不容商量的口吻对我宣称——“你们那个社科院早该解散！”

凭良心说，这话并不算多么出语惊人。我在北京也常发类似的牢骚，觉得这个或许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学术衙门，简直就没有多少存在的必要，还不如把十室九空的办公大楼租出去算了。可无论如何，一旦这种咒语从别

^{*} 这篇旧文构思于1997年，起草于1998年上半年。当时我还住在石景山那边的社科院宿舍，呼吸着举世最污染的空气，却为了中国的知识生产体系而煞费苦心，觉得它实乃中国文化的命门。文章写成以后，也曾请担任中层领导的几位先生过了目，当时我们的私交还允许彼此攀几句话。但可惜的是，他们对文章的评价虽不一致，态度却是相同的消极和麻木。此种反应使我顿起调离之心，并在出国讲学以后立即付诸实施。然而有意思的是，偏生在调出社科院以后，回头重读这篇旨在帮它寻找“生存理念”的旧作，却觉得那里面虽不免有些牢骚，倒显出我曾真心偏爱过原单位的，否则就不会为它的改革大计而不惜犯颜得罪了。正因为这样，眼下虽已属隔岸观火、多管闲事，我仍愿把这份多余的操心奉献出来，哪怕根据后来的观察，我当初为它寻找的“自我理由”已日渐沦为空想，甚至只成了我个人书呆气的笑柄。——作者2000年初夏补记于北京大学

人口中吐出，把自己数落得几成“丧家之犬”，仍觉得既不对味也不甘心。我遂正襟危坐地认起真来，向他仔细讨教何出此言。

本来，这位朋友为人为学均相当谨慎，非精思熟虑决不轻易发话，往往能把我憋得难受。所以我刚开始并未打算挑起争辩，满以为他既能对此斩钉截铁，就准有一肚子充足理由垫底，也教我能借机多明白点儿事理。可没承想，他接下来支支吾吾了一番，竟不仅未能使我信服，反使我暗自生出疑窦，检省起自己原先的怪话来了。

从此之后，我就悄悄地开始留意：大凡负笈或曾经负笈大洋彼岸的学人，几乎都会不假思索地脱口而道——“社科院早该解散”，可一旦深究他内心所执的依据，又都同样有点儿讲不出口，说穿了无非是那句——“连美国都没有”！

但这却使我口既不服，心更不服。假如你只想历数社科院的弊端，那么我完全可以跟你站到一起，哪怕把它列举得“罄竹难书”。而你若想在更深的层次上剥夺它的生存权，那么就算我没准儿也会投票赞同，但你却得给我个像样点儿的说法，至少得比“连美国都没有”更像个理由。

美国的国力岂是随随便便比得了的？它那绵绵不绝的知识原创力，主要来自众多明星大学间的激烈竞争，而这些早已扎根于市民社会中的大学，又享受着广谱分布的各类基金会的多方支持。记得去年到芝加哥参加“亚洲研究协会”年会，那盛况真有点像我们万头攒动的庙会，光登记注册就得耐住性子排个把小时长队，而老友晤谈也只敢偷得一杯咖啡的空闲。遂令人不由赞叹其学术储备之雄厚，仿佛一人随便写出一篇就够你读上半年！由此，我们哪怕再无头脑，也应该省得：美国的富家模式是无法原样照搬的，否则就只有抄起手来“俟河之清”——先等大量剩余资金从市场的浑水中沉淀出来再作道理。然而可惜的是，且不说离开知识更新的有力配合之后，中国社会还能否良性循环地发育到那一步，就算它只靠“单向度”的推动也能苦熬到那一天，我们怕也早已萎缩成了脑容量极小的“猿人一族”。

再说,尽管美国的知识生产体系财大气粗,谁又道它全无问题?如果不是盲目崇信的话,那么撇开自然科学和狭义社会科学不谈,至少就我本人的专业视野而言,任何人文学者在哈佛周围的书店里逛久了,都难保不会暗呼蹊跷——何以美国拥有那么多功力深厚的同行,但将其全部知识原创性叠加在一起,却远远及不上一个小小的巴黎?我迄今没能想清其中的原委,弄不懂这究竟是由“缺乏历史传统”所致,还是由“职业化过度”所致,抑或由“太过贴近市民社会”所致?然则成因虽属待考,收效却是明摆在那里的——他们漂在钱海里的人文学科,尽管成绩无疑卓著斐然,尽管一流学者多如恒河沙数,却鲜能涌现世界水平的“超一流”学者,而往往要甘当欧洲学术成果的“二级市场”(尽管当得很有效验),故其“投入产出比”难说已臻最佳,其“学术生产力”仍然有待提高。

顺着上述雾里看花的猜想,我甚至有些不成熟的臆度:一个较为平衡的知识生产体系,似应在空间上表现为层层扩大的同心圆。先由内涵较深的“学术界”居于核心位置,再依次扩展为外延较广的“知识界”及“文化界”,而此三者须靠持续反馈来不断寻求呼应和同构。所以,人文学术界并不生存和活跃于真空之中,它既要把自己的影响逐层向外扩散,也应从总体文化语境中汲取刺激或冲力,以期形成研究和实践间的良性互动。以这种理想尺度来衡量,似乎美国的人文学在发达完备之余,又稍嫌太过独立自主了一点儿,未能跟外缘层次形成充分的呼应。而在这种自律封闭的游戏规则中,再受到“终身教席制”的沉重就业压力,学术新锐们最念兹在兹的问题意识,虽说看似样样都跟人类的困境有关,实则多要由学术话语本身来遗传,久而久之难免落得创意不足。由此一来,尽管美国的学府多无森严的围墙,但其间贪多无厌的专题细部报告,还是把周围的社区文化映衬得冷清稀落,使人感到无形的隔膜和淡漠。另外更其吊诡的是,一旦短少了我们靠阅读了解到的巴黎咖啡馆里那种共同参与的随兴所致的高谈阔论,那么尽管纯之又纯自说自话的学术生涯似乎更加高居于象牙塔的顶端,却竟无益于保持作为知识贵族的心气,反使这项事业更向世俗职业趋

同,有时简直类乎“知识店铺”里的谋生手段……

不过,还是让思绪赶紧收缰回来,少去念叨别家的“百尺竿头”,先来操心自家的断壁残垣罢。说真的,如从考入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班那天算起,我也已跟这个机构厮混了十好几年;此间不管想得清楚没有,总还算接触过不少思想的难题,偏偏未曾反省过这个栖身已久的所在。于是,社科院过去和现在的文化功能究竟如何?它今后还能否再找到生存与发展的理由?……这类疑虑便渐次积成了欲罢不能的论题。——当然我还得解一句嘲:并非有谁要大唱“位卑未敢忘忧院”,而实因每每被逼出忧患意识,所以即便行将为之殉葬,也总想当个“明白鬼”。

二

先来清算当初那笔糊涂账:人们何以想要创建社科院?

饶有兴味的是,我们其实很容易就此推度:受以往那种不言自明的文化心态驱动,老一代人大约也同样无需思索,就觉得非要建立这类机构不可,因为在他们耳濡目染的游戏规则中,只要国家还像个国家的样子,就非得有个国家级的最高学府。——难道历代王朝能缺少翰林院么?难道前朝政府能缺少“中央研究院”么?难道苏联老大哥能缺少国家科学院么?

同样意味深长的是,我们又很容易顺势推想,恰恰由于上述样板的并存,最初仅为中科院之“学部”的社科院,受多样化制度来源的牵制,其实际功能从一开始就并不十分单纯,而既有“养士”的一面,也有“对策”的一面。前者似乎是从翰林院间接秉承下来的,它旨在向有资格享受礼遇的人士,主要是成名已久的资深学者,间或也包括退出宦途的高级干部,提供某种荣誉性的优渥闲差,并不硬性要求研究结论作为回报;后者则大约是比较照着苏联的样板,直接在“中研院”的旧部上形成的,它打算集中知识分子的智能和热情,要么为尚未做出的决策出谋献计,要么为业已形成的政令提供论证,总之是扮演“智囊团”的幕僚角色,自觉服务于国家的利益或意志。

上述区分也许只属于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而在实际操作中却并非总是泾渭分明的，且在不同时期里亦或有彼此消长。如果政治空气太过紧张压抑，已容不下任何形式和程度的“群言堂”，这个机构的“对策”功能就会大大萎缩，想来此有所作为者就会痛感报国无门，无奈之余也只得被养起来；相反，如果社会风习太过讲求绩效，“吃闲饭”已显得不大合乎潮流，它的“养士”功能也会大大式微，想来此颐养天年者就会清闲却不自在，保不齐哪天也会动念“躁进”。或许上面这句话所包含的内容，并不像其表面语气那般“虚拟”，而能从一个侧面概括几十年的院史掌故，只是本文眼下无意翻拣这部悲喜交集的“《儒林外史》新编”。

另一方面，跟此种复杂定位不无关联，这个机构的下属研究分支，好像也并非仅仅沿循一定之规而设。如果单从“养士”的初衷出发，那就得尊重承袭下来的人才和学科分布，实事求是地“因神设庙”，所以正像“中研院”原以史语所为最强一样，社科院最开始也势必要向基础文科倾斜，甚至一次就重叠设立了三家历史所；但设若要从“对策”的动机出发，却应着眼于实际的咨询需求，去招兵买马另起炉灶，所以越是晚近创立的研究所，往往就会显出越强的应用取向，仿佛否则就难觅立锥之地。也许，不从这种特殊逻辑出发，就无法理解许多不合常理的怪事。——比如，何以那些公认的传统研究强项，反倒并不急于组建后续梯队，竟被听任走向触目惊心的衰微？何以那些学术传统较弱的机构，反倒并不急于加深基础理论，只图展开短线实效的经验研究？何以各种机构会遭到条块分割，既有依学科纵向设立的研究部门，也有按区域横向划分的咨询部门？……

还得清算一笔与此相关的糊涂账——它那显然不够贴切的含混名称。为什么一个当初主要以人文研究见长的学术机构，竟会名不副实地仅仅自命为“社会科学院”？这种困窘显然派生于已往的意识形态，因为此种学说一向宣示下述简单分类：总共只存在着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两类实践，由此又总共只产生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种知识。当然应该公正地承认，把人文学术荫佑为仿佛具有客观性质和实用功效的“科学”，这在当年那种

恶劣的语境中,无疑具有相应的保护色彩;但同时也应敏锐地察觉,一旦把人文学科统称在社会科学的名下,这种笼统混淆的定位方式,本身又蕴涵了深刻的认识危机。受人文研究自身品格的注定,这种学术活动不仅不能服务于任何外在的和浅近的功利目的,还必须跟此类目的自觉地拉开距离乃至唱出反调;所以,倘不能看到此类学科惟以提升文化自身品格为己任,且本身就构成了最高层次的公民文化,而误把它视作理应听从将令的同心同德的“智囊团”,那就很难真心宽容——更谈不上谦逊地听取和受益于——它必须表达的不同意见,也就极易从根本上忽略这种学科的存在价值。

三

平心而论,尽管存在着上述潜在矛盾,尽管经受了各种外压内耗,社科院仍然享有过相对辉煌的岁月,也曾做出过不可替代的文化贡献。

即使是作为翰林院子遗的“养士”传统,也并不像初看那样纯属社会的“盲肠”,而无意间起到了一所国家级研究学府本应具有的“无用之用”。它不经意地部分维护了老一代研究家的学术权威(尽管这种权威曾被冠以“反动”的定语),从而部分维护了他们默默守护的治学传统(尽管这种传统已无法得到及时的损益),甚至部分维护了他们作为知识贵族的做派(尽管这种做派已难被平民化的后学所效仿)。由此一来,即使在外在“大气候”已容不下一张书桌的时候,它的内部“小气候”仍要比别处更宜于从事精神活动。虽说当时的语境已很难鼓励自出机杼的大胆运思,但老一代学人仍然凭靠本身的功力和造诣,在文学史学哲学考古语言诸门人文学科中,不露圭角地护持守卫着学术的自我尊严,以至于我们简直无法想象——设若当年竟连这个知识集群也已被夷平遣散,曾如此命若游丝的斯文更将如何维持自身于不坠?

缘此,重要的就并不在于列举它往日有目共睹的学术成果,以及曾在